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Nikolai Trubetzko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文学论著

[俄]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 著

王加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文学论著

(俄)N. S. 特鲁别茨柯伊 著

王加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论著 / (俄) 特鲁别茨科伊著; 王加为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ISBN 978-7-100-12081-4

I. ①文… II. ①特…②王… III. ①文学评
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6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文学论著

(俄) N. S. 特鲁别茨科伊 著

王加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81-4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½

定价: 26.00 元

N.S. Trubetzko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0 年英文版译出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编者前言

自从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已成为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前沿问题，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诗学”亦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领域。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转向，但并没有使“语言学转向”成为历史的遗音，相反，这各种各样的转向都可以从语言学转向找到根据，并使语言学转向在更为深广、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人们对语言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的热情和兴趣，不仅在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这一重要的思想事件，而且亦由语言本身的性质和地位所致。我们知道，语言既是我们生存的空气又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既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又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既是构成文学的最基本元素，又是文学最直接的存在方式，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理应是文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曾经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性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

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所知甚少的文学研究者都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的这一陈述虽然是在50年前做出的，但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理论学界，自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相结合以来，历经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和后结构主义，以至今天盛行于英美和欧陆各国的文体学、叙事学研究，把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努力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1980年，“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简称PALA）在英国成立，其宗旨就是要推动语言学与诗学的交叉研究。这个学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学术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年会，并拥有一份国际性的专业刊物《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语言与文学》这一会刊外，1972年，由伊顿·特雷弗（Trevor Eaton）创办的《文学语义学》（*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也旨在推进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探索。而近些年来在西方欧美学界兴起的语言与文学、文化之间“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也是运行在这一理路上的。

与国际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译介则显得冷清得多。虽然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孙复《答张洞书》），都认为“语言”是诗文得以“成”“立”的根据，都认识到语言与文学、文化甚至文明的关系；虽然中国

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文学语言学或语言学诗学方面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学术队伍来说，相比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语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在这一领域投入的力量还显然不足。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些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方面的文论选，并且陆续有一些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方面的译作问世，对推动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语言学诗学的关注，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这个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今天仍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研究领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鉴于国内学术界在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和译介方面的这一状况，我们主持编选“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以使这一未竟的事业得以持续、深化和发展。

本译丛从翻译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方面的经典理论家的经典作品开始，再逐步向涵盖更广的、当今时代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作品延伸。所遴选的篇目涵盖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文学阐释学这几个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中的经典或优秀之作。通过这套译丛，希望能对国内学界“尚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尚未充分展开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有所推进或助益，并能对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的一些文学、文化研究现象提供可能的语言学路径。

我们知道，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在西方学界又出现了“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多种转向，但这些转向并非意味着“语言学转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已经失去当下意义。

文化转向、空间转向都是与语言观念的诗化、审美化转向相联系的，它实际上也可看作语言学转向的深化、扩展和延续。西方传统的哲学语言观强调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语言，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就势必成为不同的东西。但随着语言观的诗化、审美化的转向，人们逐渐抛却了往日的对于语法和逻辑的虚妄信念，不再从逻辑和语法，而是从诗、文学、艺术或修辞解释语言的本质。如果一切语言都具有修辞本性，都是诗，是文学，文学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将与所有用语言写成的文化文本交织汇融在一起。文学既然失去了明确的边界，文学研究自然也疆界难守，并从而拓展成了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这便是“文化转向”得以发生的内在语言逻辑。同时，在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对于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的强调又是与一种线性时间观相联系的，反对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势必又导致对于线性时间观的批判和质疑，从时间化向空间化的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都不是对语言研究的摈弃，而是一种“内化”或“转化”而已。这也使得，当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这些研究领域时，便会更有效地切中问题的内在机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套“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中的“语言学”不是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使用的，它既包括“语言学”，也包括“语言哲学”。“语言学与诗学”研究也因此是“语言学、语言哲学与文学理论”的交叉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也不是形式主义研究的代名词，相反，它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强辐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领域，语言与哪

些现象有关系，“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就与哪些现象有关系。如语言与心理、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符号、语言与修辞、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决定了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关涉这些领域。同时，对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来说，西方学者一方面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或对文学语言进行专门研究，从而生成一种“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进行“继发性”研究，从而形成一种“继发性”的“语言学诗学”，如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无论是“原生性”还是“继发性”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都可能由于他们所依据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基础或选取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谱系，如语言形式诗学、语言文化诗学、语言存在论诗学、言语行为诗学研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增生性、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决定了我们这一“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不是完成式的，而是开放性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译丛的筹划离不开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从译丛的最初提议，到篇目的最后选定，再到出版社的联系，周老师都给予了大量的无私帮助，译丛出版之际，特别向周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丛的编选还得到编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时的合作导师迈克·图兰（Michael Toolan）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在这里也向图兰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与编者一起访学的学友，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赵明珠博士，也为译丛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也一并表示感谢！同时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各位译者积极参与译丛

的翻译工作，没有他们辛苦的劳动，该译丛的面世也是不可想象的。

赵奎英

2015年4月17日于南京

编者序

vii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柯伊 (Nikoláy Sergéyevich Trubetzkoy) 只活了四十八年。他于1890年生于莫斯科，于1938年逝世于维也纳。本书及另一书（即将出版）是特鲁别茨柯伊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另一书收录了特鲁别茨柯伊有关政治和历史的的文章。由于另一书的开头是特鲁别茨柯伊的生平回顾，因此本人在此可以省却对特鲁别茨柯伊的生平介绍，只需提几个重要事实即可。特鲁别茨柯伊在莫斯科大学接受教育，学的是印欧语言比较学。十月革命之后他移居国外——先是到了保加利亚，然后又到了奥地利。他在维也纳大学斯拉夫系当了十五年的系主任。虽然现在一般认为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的创始人，但其实他在数个领域著述颇丰。战争之后，罗曼·雅各布森 (Jack Jakobson) 为了推广好友的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英语界对特鲁别茨柯伊的认可相当缓慢。他的《音位学基础》(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甚至在法语、俄语版面世多年后才有了英语版。雅各布森出版了特鲁别茨柯伊哲学研究的三篇论文 (1963b)，又

出版了一部特鲁别茨柯伊书信集(1975),但由于论文和书信都用俄语写成,因此西方很少有人读到。

特鲁别茨柯伊在维也纳讲授了多门课程,其中关于俄罗斯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古俄罗斯文学的讲稿在其去世后被翻译成德语出版(1956; 1964b; 1973)。特鲁别茨柯伊的遗孀也将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稿作为独立文章发表出来(1957; 1960a; 1960b; 1963a; 1964a; 1965)。1948年,出版了《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译本; 1954年,出版了古俄罗斯文学课程介绍英译本; 1971年,出版了论阿发那西·尼吉丁(Afonásiy Nikítin)日记的论文英译本。虽然出版了这么多,但人们对特鲁别茨柯伊文学研究的了解远没有达到他理应得到的程度。有一件事让曾任*Novy zhurnal*(《新评论》)编辑的罗曼·加尔(Roman Gul')颇感自豪: V. V. 维诺格拉多夫(V. V. Vinogradov)从*Novy zhurnal*找到特鲁别茨柯伊的文章来佐证自己的观点(Gul' 1972, 325; 为1967年纪念版的重印)。但除此之外,特鲁别茨柯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请参阅从德语译成意大利语的Trubetzkoy 1980a论《罪与罚》的段落)。特鲁别茨柯伊的课程名称是“Dostoevskij als Dichter”; 书的名称是“Dostoevskij als Künstler”,可能是为了与裘利斯·梅耶格拉夫(Julius Meier-Graefe)的“Dostojewski der Dichter”区分开来。如果将这些题目翻译成英语,意思应当是“作为大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该书由一篇介绍性文章和三个章节组成,这三个章节分别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平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俄语版中这些文章的题目肯定

不是特鲁别茨柯伊本人所起的题目。现在这个版本保留了*Novy zhurnal* 的素材划分，但略去了题目。略去的部分可从德语版中再行查寻。在翻成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翻译者所使用的特鲁别茨柯伊档案记录也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记录中竟然没有将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讨论收录进去。最后要提示本书读者的是，本人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为小说中的人名点出了重音。1982年意大利版的人名重读不可仿效，因为其中的许多重读都是错误的，因此我的重读也可能是错误的。

编辑本书的意图，是让特鲁别茨柯伊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能为广大学者所用。本书按以下顺序收录以下文章：1956，129-34，135，137，138（都不完整），143-44；1957；1960b；1965；1963a；1964a；1960a；1913，326-30；1975，16-17，86，97-98，302-4；1973，51-57（删节了几个句子），66-68，73-76（稍有删节），83-89，132，133-137（第131，132页的句子只有几行）。本书序言部分对特鲁别茨柯伊所恪守的文学批评原则进行了深入讨论。雅各布森为Trubetzkoy，1975所写的序言、为Trubetzkoy，1973所写的后记，Jagoditsch，1955和1977，Titunik，1976以及Di Salvo，1980，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特鲁别茨柯伊在其语言学和政治活动背景下的文学研究成果总汇，还从未有人分析过。迄今为止只有Tschizewskij，1964对特鲁别茨柯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进行了评论。

特鲁别茨柯伊曾说过，要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性传记，必须融入他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时代。其实要写出所有伟人的生平，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本人在评论特鲁别茨柯伊这位文学

ix 评论家的时候特别注意适度的问题。在研究特鲁别茨柯伊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关系的时候，我并没有列出文献资料，因为许多重要的资料都有英语版，且有关形式主义的必要信息可在1981年版的艾利克 (Erlich) 以及特鲁别茨柯伊的纪念文集 (FE) 中查到。我还专门留出几页对特鲁别茨柯伊与巴赫金进行了比较。关于特鲁别茨柯伊的评论主要是在序言里，而对巴赫金的评论则另在他处。(可参见Clark and Holquist 1984；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对于理解此处的讨论尤为重要)。

我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为特鲁别茨柯伊的文学分析论文写注释的念头，当时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二十年代都有些什么样的研究。现在我知道，如果我写了注释，那么特鲁别茨柯伊自己的文章和讲义反将成为这些评论的序言。这种情形确实存在：对中世纪文学的编辑总是按照这个路子进行：质量上乘的1977年版蒂尼亚诺夫 (Tynyanov) 文集，就可视为对《贝奥武夫》(*Beowulf*) 和《歌特史》(*Getica*) 的注释。当我开始详细审核“二十年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一节的数据时，突然意识到我离《贝奥武夫》的模式有多近。也许英语初版的特鲁别茨柯伊文学批评文集应当树立一个更加适中的目标。(请参见本序言结尾部分关于韵律问题的讨论。)

在结集本书时，明尼苏达大学馆际部 (Interlibrary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给予了大力协助 (他们总是乐于助人)。全部手稿的准备由戴比·马丁夫人 (Mrs. Debbie Martin) 完成。在此我要感谢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有了它的拨款 (1987)，我才能用一整个宁静的夏季致力于这两部纪念特鲁别茨

柯伊的书。在美国，从法语和德国翻译过来的一部分书得到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部分资助。苏联改革还没有发展到其官员乐意帮助移民海外的人出版他人著作，或出版评论他人著作的地步。因此我要衷心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学术事务部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没有他们的补助，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是不可能承担本书的出版费用的。

或许应当对翻译工作简单地说两句。本书的英译本虽然由我独自负责，但是我的同事们，尤其是出版社的编辑贝弗利·凯默 (Beverly Kaemmer) 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为了更好地表达此书的目的，在此引用特鲁别茨柯伊对其著作《欧洲与人类》(*Europe and Mankind*) (1920) 出版他国语言版时的评论。他的评论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常常对他的原文进行大胆处理，如删掉某些词、纠正作者的句法，等等。

如果您与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进行合作，本人显然没有反对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过我必须指出，虽然有了施勒默尔先生 (Mr. Schlömer) 的参与，我认为您送给我的校样在语言上仍有瑕疵。由于我本人并不是德国人，因而争辩起来十分困难，但您似乎不必进行刻意的逐字翻译，因为这种逐字翻译会破坏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我认为您两人可对照俄语版进行翻译。当两人进行翻译合作时，最好是一个人读原文，记住其大致内容，在不对照原文的情况下检查译文，将译文视为完全独立的本文，看它是否通顺，是否“流畅”。在对译文进行修改之后，如果产生了与原文不符的情况，那么翻译者可以对照原文提出反对意见，并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个或那个句子的措辞以便准确表达作者

的观点并取得理想的文体效果……您的校样让我相信：有了您这样的翻译者，我的观点将会得到非常准确的表述。如果您在文体上多花点功夫，那么这个译本将无懈可击——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目标，因为原文具有“莫斯科学派”那种沉闷乏味语言的所有弊端，而这种语言从福尔图纳托夫 (Fortunatov) 开始，由他的弟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我努力遵循特鲁别茨柯伊的建议，希望我的英语是一种适当、“流畅”的英语，而不是生硬的逐字翻译，尤其是特鲁别茨柯对福尔图纳托夫学派（福尔图纳托夫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风格的评论不无道理，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目 录

编者序	1
导言：作为文学研究专家的特鲁别茨柯伊	1
民族志、民间传说和中世纪文学	1
现代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伊与 俄罗斯形式主义。特鲁别茨柯伊与巴赫金	25
韵律的研究	55
参考文献	57
古俄罗斯文学	69
南部俄罗斯编年史的文体风格	69
《伊戈尔之歌》的结构和风格	72
朝圣故事的形成	76
圣徒传的写作风格	80